『中國學』第85輯 (2023.12.31.)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23.85.85.3
pp.043-059. ISSN : 1229-9618

现代汉语形义错配现象研究述评*

杨帅** · 金美锦***

【目 录】

1. 引言
2. 形义错配的定性
3. 形义错配的语义特征
4. 形义错配的产生机制
5. 结语

【摘要】

形义错配现象指的是句子中存在的形式上做定语，而语义上匹配的却是其他句法成分的现象，有的学者也称这类成分为伪定语或准定语。纵观以往对于形义错配现象的研究，学界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认为形义错配主要分为伪领属和伪名量两种类型；形义错配结构并非原型结构，而是由某种原型结构转换而来；形义错配结构中的NP2为无指性成分。此外，尚有一些问题并未形成共识。对于形义错配结构（伪领属）内部存不存在领属关系的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形义错配结构内部NP1和NP2之间不存在领属关系，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在形义错配结构的产生机制方面，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视角相同的学者也存在具体观点的差异。文章分形义错配的定性、形义错配的语义特征和形义错配的产生机制三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简要归纳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形义错配；定语；伪领属；伪名量；NP1的NP2。

* 本文受2022年度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河学院专项资金项目“现代汉语名词数范畴研究”（项目编号：2022-KYYWF-0378）资助。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学习借鉴了山东大学庄会彬教授的系列研究成果，并受到庄会彬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匿名审稿专家和『中国学』编辑部给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 杨帅，第一作者，黑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yangjaynara@126.com）。
*** 金美锦，参与作者，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外籍教师（1989302@naver.com）。

1. 引言

所谓形义错配（syntax-semantics ismatch），指的是句子中存在的形式上做定语而语义上匹配的却是其他句法成分的现象，有的学者也称此类成分为伪定语或准定语。[1] 本文除了介绍不同学者的观点时使用他们各自的命名形式外，其余统一使用“形义错配”指称此类语言现象。

学界较早关注到形义错配现象的是吕叔湘（1965）先生，吕先生敏锐地指出，例①中“他的老师”是一个领属结构，而例②中“他的老师”并非领属结构，而是指“他当老师”这件事。

① 他的老师教得好。
② 他的老师当得好。

吕先生认为“他的老师”这个结构平时只是一般的定中结构，例②的这种特殊意义是在句式里获得的。

吕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对这一语言现象展开探讨。前期代表性的学者及成果主要有赵元任（1979）、黄国营（1981、1982）、朱德熙（1982）等。前期的研究主要是对形义错配现象进行描写，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论解释。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更多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形义错配的形成机制等问题，产出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下面，我们将从形义错配的定性、形义错配的分类、形义错配的语义特征、形义错配的产生机制四个方面梳理以往的主要研究成果。

2. 形义错配的定性

形义错配的定性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形义错配结构是否是原型结构的问题，另一个是形义错配结构（伪领属）内部存不存在领属关系的问题。

1）形义错配结构是否是原型结构的问题

1）朱德熙（1982）称之为“准定语”，黄国营（1981）、黄正德（2004、2008）等称之为“伪定语”，萧国政（1986）称之为“隐蔽性施事定语”，张伯江（1994）称之为“广义的领属定语”。

目前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形义错配结构并非原型结构，而是由某种原型句式结构经过一定的转换步骤而形成的。[2]例如，黄正德（2004、2008）将轻动词理论和动名化相结合，认为伪定语结构是带有轻动词DO的D-结构经过动词核心移位形成的S-结构。[3]沈家煊（2007）利用句式间的“糅合类推”理论解释形义错配结构的形成。刘礼进（2009）认为，准定语结构是动词拷贝句式经过关系化和核心名词提升移位带来的。邵敬敏（2009）认为，准定语结构是原型句式经过结构重组形成的。此外，彭玉兰（2001、2005）、钱书新（2005）、邓思颖（2008、2009、2010）等也都持形义错配结构并非原型结构的观点。[4]

2）形义错配结构（伪领属）内部存不存在领属关系的问题

对于形义错配现象，目前广泛认可的是分为伪领属和伪名量两种。学界目前讨论的较多的是伪领属，伪名量的语义关系论述得相对较少。伪名量主要涉及定语的语义指向问题，比较显见的是伪名量语义上是指涉动量的。

对于伪领属结构“NP1的NP2”来说，总的来看又分为不承认NP1和NP2之间存在领属关系和承认NP1和NP2之间存在领属关系两派观点。

不承认NP1和NP2之间存在领属关系的如吕叔湘（1965）、赵元任（1979）、朱德熙（1982）、黄正德（2004、2008）、邓思颖（2008、2009、2010）、刘礼进（2009）等，他们基本认定形义错配结构中NP1和NP2实际上应是主语和宾语的语法关系。赵元任（1979）把宾语位置的伪定语称作“领格宾语”，认为这种处于领格位置的成分语义上并非表示领有，而是动词动作的对象，所以实际上在语义上是宾语。由此可见，赵元任并不认为形式上的领属结构都是表示领属意义，应该将形式和语义分开来看。朱德熙（1982）举出三类准定语结构：

（A）张三的原告，李四的被告。
（B）他的篮球打得好。
（C）我来帮你的忙。

朱德熙（1982）指出，这些定语都是由指人名词或人称代词组成的，按说应该表示领属关系，可是（A）（B）（C）里头的“我的”“你的”“他的”都不表示领属关系。

黄正德（2004、2008）认为，NP1和NP2之间的关系不是物主之于物件，而是主语之于

2）胡建华（2016）对形义错配现象持非移位的观点。
3）黄正德（2008）一文曾在2004年做过报告，后于2005年定稿。
4）文中第三部分“形义错配的产生机制”结合例句对各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

宾语的关系。刘礼进（2009）用关系结构提升理论的移位与合并方法分析准定语和伪定语的生成。认为“NP1的NP2+V得R”句式都是一种隐性的关系化结构，经历了动词拷贝句转换为关系结构式，最终转换为准定语句式的过程。因此，NP1和NP2之间是主语和宾语的关系，而不是领属关系。黄正德（2004、2008）的句法推导过程中，“的”是在D-结构中随着GP的形成而自动存在的，而在刘礼进（2009）的关系化移位与合并分析中，“的”是在最终的关系分句提升至Spec-DP过程中从词库插入的。

邵敬敏（2009）分析了朱德熙（1982）举出的三类形义错配结构的例子，认为形义错配结构形式上是定心结构，但语义上隐含着一个谓语动词或者介词。换言之，邵敬敏认为从语义上看，形义错配结构的NP1和NP2之间并非定中修饰关系，当然也就无所谓领属关系。邵敬敏（2009）将准定语分为了指派性准定语、技能性准定语和关涉性准定语三类，此三类形义错配结构都是某个原型句式经过结构重组形成的。从邵敬敏认定的三类形义错配结构原型句式来看，指派性准定语结构的NP1是主语，NP2是宾语小句的主语，二者之间是担当某一身份或角色的主体和身份、角色的关系；技能性准定语结构的NP1是主语，NP2是宾语，二者之间语义上是施受关系；关涉性准定语结构的NP1和NP2是动词的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NP1是动作关涉的主体，NP2是目标性角色。

承认形义错配结构中NP1和NP2之间存在领属关系的学者有萧国政（1986）、张伯江（1994）、彭玉兰（2001、2005）、钱书新（2005）、沈家煊（2007）、李绍群（2010）等。萧国政（1986）称形义错配结构中的NP1是“隐蔽性定语”。彭玉兰（2001、2005）认为定语是句法层面的，应由形式因素决定它的性质，不应因语义另指而否定。因此，像学界曾讨论过的“这本书的出版”，彭玉兰认为也应当认定为定中关系。此外，彭玉兰还认为非典型定语是语用的结果。

张伯江（1994）认为，领属意义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一般所说的领属意义是狭义的理解，而在“他的老师当得好”这样的句式中，“他”和“老师”是广义的领属关系，是对老师这种抽象身份的领有。更进一步，张伯江认为“NP1的NP2”表示的语法意义就是领属关系，至于是狭义的领有还是广义的领有，是在具体语境中才产生的分化。事实上，每一个“NP1的NP2”结构都是有歧义的，至少包括狭义领属义和广义领属义。例如，单独看“他的老师”，在语法意义上就是一个领属结构，只有具体出现在“他的老师教得好”和“他的老师当得好”两种语境中时才出现了狭义领属和广义领属的区别。钱书新（2004）认同张伯江的观点，认为“NP1的NP2”是领属结构，NP2除了可以是具体事物，还可以是抽象事物。钱书新（2005）认为应从句法表征判断结构类别，他从原型范畴理论出发，将“NP1的NP2”结构划分为原型和非原型两类，内部不存在修饰关系的结构是非原型偏正结构。

沈家煊（2007）认为，“他的老师当得好”中“他的老师”虽然语义上不是表示通常

的领属关系，但它具备领属结构的形式就多少还带有领属的意思。“他的老师”有“他的老师角色”的意思，“当得好”是指老师这个角色当得好，因此这种形义错配的定语叫“准定语”比叫“伪定语”好。此外，像“你的主席，他的秘书”是强调角色分配，人和人担任的角色有固定的分配，所以可以用领属结构的形式表达。而像一个学生张三骂老师，一个学生李四骂家长是不会说“张三的老师，李四的家长”的。因此，沈家煊（2007）认为“NP1的NP2”本质上还是表达领属关系的结构，只是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领属和抽象意义上的领属的区别。

李绍群（2010）将领属关系分为典型的领属关系和非典型的领属关系，非典型的领属关系表达的是一种抽象的领属。他将“拆别人的台”和“他的篮球打得好”中的“别人的台”“他的篮球”归入非典型领属结构，认为NP1是指称义，而NP2是内涵义。

3. 形义错配的语义特征

以往的研究在形义错配的语义特征方面主要关注的是形义错配结构中两个NP的指称性质问题。

张伯江（1994）认为，“他的老师当得好”中“老师”是无指的，他同时指出，静态的词“老师”或静态的结构“他的老师”不具备有指和无指的区别，只有放到动态的语境中才获得有指和无指的意义区别。此外，张伯江（1994）还明确指出，领属关系是语法意义，领属结构的语法意义就是领属关系，无论所领有的事物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有指的还是无指的。换言之，张伯江认为领属结构和领属关系的对应只涉及语法层面，不涉及语义层面，探讨领属结构是不是错配了非领属关系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话，在张伯江看来，形义错配实则是一个伪命题。

张斌（1998）认为，“他的老师当得好”中“老师”是无指的，而“他的老师教得好”中“老师”是有指的。彭玉兰（2001）认为，当“NP1的NP2”为真领属时，NP2是有指的；当“NP1的NP2”为伪领属时，NP2是无指的。此外，彭玉兰还提到了当“NP1的NP2”为伪领属时存在较强的语境依赖性，即“NP1的NP2”为伪领属时不能单用。吴怀成（2007）也认为，NP2的无指语义特征是区分准定语结构和一般定语结构的条件之一。邵敬敏（2009）认为，“NP1的NP2”构成准定语结构时，NP1是定指的、确指的，指代某某具体的人，而NP2是不定指的，泛指的，指代生活中的某种身份、职业或角色等。“NP1的NP2”独立出现的话，如果NP1和NP2都是定指的话，语义优先选择解读为领属关系，但是如果NP2是不定指的话，就可能形成伪定语结构。此外，李敏（1997、2006）、金镇宇（1999）和吴早生（2012）等也有相关论述。

综上所述，对于形义错配结构中两个NP的指称问题，学界的主流观点倾向于一致，学者们普遍认为形义错配结构中的NP2为无指性成分。我们也赞同这一观点，实际上，“他的老师当得好”只有在“老师”是无指的情况下，即可以理解为“他扮演老师角色扮演得好”（此时NP2指职业）时，“他的老师”才可以理解为伪定语结构。而当把“老师”理解为有定的个体（individual）时，此时“老师”从“当”那里取得外部题元角色（θ-role），“他的老师”便不再是伪定语结构，而是一个真定语结构。

4. 形义错配的产生机制

学者们普遍认为形义错配结构并非原型结构，而是某一原型句式经过变换而形成的，[5]如朱德熙（1982）、李锦望（1993）、张云徽（1996）、黄正德（2004、2008）、沈家煊（2007）、吴怀成（2008）、邵敬敏（2009）、刘礼进（2009）、邓思颖（2008、2009、2010）、李绍群（2010）等。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主要有生成语法视角、认知视角、韵律语法视角、语用视角、修辞视角、信息结构视角以及从“的”的用法展开研究的视角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生成语法视角和认知视角的研究成果，下面我们对这些研究成果做简要介绍。

1）生成语法视角

从生成语法角度研究形义错配结构产生机制的学者主要有Huang（1982），黄正德（2004、2008），邓思颖（2008、2009、2010），刘礼进（2009），韩巍峰、梅德明（2011），许歆媛、潘海华（2014），杨炎华（2014），程工、熊建国、周光磊（2015）和庄会彬（2021）等。下面选取部分代表性观点做简要介绍。

梅广（1978）认为像“他的老师当得好”这类句式是从一个深层结构转换而来的：

③ a. 他当老师当得好。（深层结构）
b. 他老师当得好。（删除“当”）
c. 他的老师当得好。（插入“的”）

Huang（1982）的深层结构和转换方式与梅广略有不同：

④ a. 他理头发得很好。（深层结构）

5）胡建华（2016）认为这一结构是基础生成的。

b.他头发理得很好。（宾语“头发”提前）

c.他的头发理得很好。（插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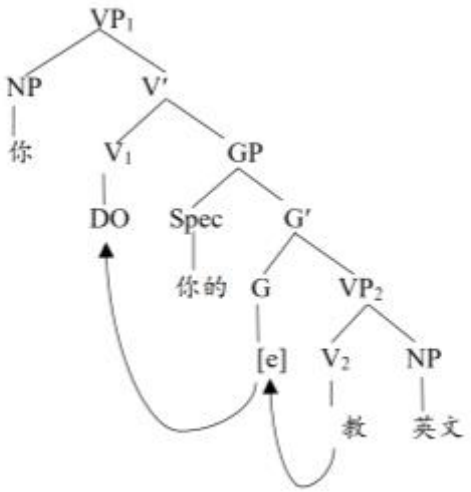
以上两种分析都是并列NP导致了重新分析，从而为“的”的插入准备了句法和语义条件。“的”的插入是表面的句法现象，并不影响句子的语义，所以形成了形式上虽然是领属结构，但语义上并不表达领属义的现象。

黄正德（2004、2008）后来认为梅广和他的的分析法存在“既有过之又有不及”的问题。一方面，NP1-NP2格局并不会都重新分析为定中关系（例如：他数学最喜欢/*他的数学最喜欢）。另一方面，很多同样的伪定语结构用重新分析和“的”的插入机制无法解释（例如：你走你的阳关道）。因此，他继而转变为采用词义分解（lexical decompositio n）和核心词移位（head movement）的理论解释伪定语现象。例如，对于“你教你的英文”，首先假设底层结构（deep structure）是一个双层VP结构，下层VP2是上层VP1的补语（complement），VP1的核心实为一个轻动词。VP2动名化之后，主语作为定语修饰动名化的VP2构成动名短语GP（gerundive phrase）。

我们更直观地表示这一结构形式即：

[GP你的[G’-G[VP教[NP英文]]]]

GP做轻动词DO的补语，由于V1和G都没有语音形式，不能独立成词，因此诱发V2移位填补，最终形成伪定语形式。



此外，黄正德（2004、2008）还解释了为何只有现代汉语中存在形义错配现象。他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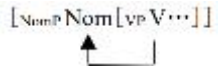
现代汉语的伪定语现象归因于现代汉语的高解析性。现代汉语缺少派生词法，所以经常用[V+NP]表达简单动词概念，[V+NP]是复式述语，可以动名化为GP并提升动词与轻动词合并。而像古汉语和英语等这种合成性比较高的语言形式，许多动词可以在词汇部门派生形成，因此没有在句法上有所体现。

黄正德（2004、2008）的推导不可谓不严密，但在具体适用时却例外频出，邓思颖（2010）、胡建华（2016）和庄会彬（2021）等都曾指出这一问题。例如，庄会彬（2021）发现，按照黄正德的句法推导方式，无法解释“小沈阳走别人的路”这样的句子。如果把谓语动名化成GP的话，应该是“小沈阳的走路”，这样的话，底层结构就是“小沈阳DO小沈阳的走路”，无法推出“别人的”。另外，按照黄正德的分析，“NP1的”便不是伪定语，而是修饰动名化结构的真定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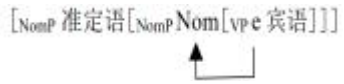
刘礼进（2009）按照关系结构提升理论的移位与合并方法分析准定语和伪定语的生成。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核心名词产生于从属分句，增加了一步关系分句提升移位至左侧Spec-DP的操作，还需要假设空算子OP对应英语的WH-词。“NP1的NP2”中NP2不带指示词，因此在按照D补足语假说将CP作为D的补足语一起构成DP短语时还需要假设存在一个零冠词。不过，刘礼进的分析倒是给“的”安排了一个明确的来源，他认为“的”是从心理词库引入的关系分句结构标句词。潘海华、陆烁（2011）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基于“动词拷贝式”和焦点结构的两套重新分析方案。

邓思颖（2008、2009、2010）指出，派生说和糅合说（沈家煊的观点，下文将介绍）都存在无法解释汉语南北方言差异的问题。首先，“他的老师当得好”这类句式在一些南方方言中是不能接受的，派生说和糅合说对此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次，无论准定语位于主语位置还是位于宾语位置，派生说和糅合说都采用同一种解释模式。而南北方言对于准定语在主语位置和宾语位置的接受度是不同的，一些南方方言不能接受准定语在主语位置的情况，却可以接受准定语在宾语位置的情况。再次，有的南方方言接受动词拷贝句和次话题句，满足吴怀成（2008）关于糅合类推的限定条件（下文将介绍），但却不能接受伪定语句，比如台湾闽语和温州吴语。有的南方方言接受次话题化的句子，但是对于相应的伪定语句却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对于这些问题，派生说和糅合说都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邓思颖（2008、2009、2010）提出了新的句法推导方案。邓思颖的方案在原则上还是赞同黄正德（2004、2008）句法移位的观点，只是在具体技术细节上有所调整。邓思颖认为准定语修饰的都是名物化短语NomP，NomP由动词短语VP和名物化词头Nom组成，Nom是没有语音形式的功能词，有诱发移位的特征，名物化短语就是VP中的V移到Nom位置与之结合产生的。即：



邓思颖将VP中的V设定为空动词e，而准定语是嫁接到NomP上的。即：



为了应对南北方言对准定语句接受度的不同，邓思颖将Nom有没有诱发移位的特征设定为一项参数，认为北方方言的Nom有这样的特征，而南方方言没有，因此南方方言不能形成名物化短语。之所以南方方言可以接受处于宾语位置的准定语句，是因为这个时候在NomP前面还有个轻动词DO，NomP做DO的补足语，虽然Nom没有诱发移位的特征，但是DO可以诱发移位，根据“中心语移位限制”（head movement constraint），这时候V的移位不能越过Nom，只能路过Nom，这样就有了让动名词名物化的机会。也就是说，邓思颖认为宾语位置伪定语的形成与NomP内核心动词的移位有关，而主语位置伪定语的形成所涉及的空动词e是在深层结构形成的，属于“深层复指”（deep anaphora），可以在具体语境中还原。也即主语的名物化短语包含的动词是省略造成的空动词，宾语名物化短语包含的动词是移位产生的语迹。

邓思颖在黄正德（2004、2008）派生说的基础上引入参数理论，解决了黄正德的派生方案无法兼顾汉语方言事实的情况，可以说将形义错配结构产生机制的生成语法解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对于邓思颖（2008、2009、2010）的句法推导方案，杨炎华（2014）和胡建华（2016）等提出了不同意见。杨炎华（2014）认为，邓思颖“名物化”的推导方案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

⑤ a.他的f老师当得好。
b.*他的当老师当得好。

按照邓思颖的观点，例⑤a中有一个名物化的空动词f，但是当空动词f真正显化成例⑤b的时候，句子反倒不成立。因此，杨炎华（2014）指出，邓思颖的句法推导方案不能解释“为什么名物化短语中的动词必须为空，而当动词显现出来的时候句子却根本不合格”。[6)]

6) 杨炎华（2014）认为“他的老师当得好”是受事话题句，“他的老师”是话题，“当得好”的主语是空主语pro。胡建华（2016）认为空主语pro补出后句子不合法，因此否定了这种说法。

胡建华（2016）认为，邓思颖的解决思路本质上是“空对空的空移位”，不具备科学研究应当讲究的可证伪性，因此首先其科学性值得怀疑。其次，按照邓思颖（2008、2009、2010）的分析，“他的老师当得好”的结构形式为：

⑥ [他的f老师]当得好。

名物化的“他的f老师”做“当”的主语，这在动词的题元角色指派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当”的词汇语义限制其选择句子作为主语。[7]再次，由于黄正德（2004、2008）的移位方案无法适用于动名词词组中主宾语语义关系并非建立在句子的主要谓词之上的情况，因此邓思颖（2010）提出空动词可以通过语境复原的观点。例如：

⑦ 他的周瑜还是比较压场的。

例⑦中，“他”与“周瑜”之间的语义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压场”上，因此，“移位说”对于此类句子便不再有用武之地。邓思颖（2010）认为，此类句子的空动词需要在语境内寻找。胡建华（2016）则指出，借助语境还原空动词的思想彻底消解了空动词假设的意义。

我们赞同胡建华（2016）的观点，语用层面解释的空间和弹性很大，空动词假设是句法部门的操作，目的是从句法层面解决伪定语的产生问题，如果最后仍留有问题需要在语用层面解决，这样空动词假设的句法价值便大打折扣，不如开始就从语用层面探求解决途径。

胡建华（2016）区分了汉语的受事主语句和受事话题句，认为“他的老师当得好”中“当得好”是兼表主动义和被动义的复杂谓语，当“他的老师”中“他”做“当”的施事，“老师”做“当”的受事时，且“当”前不能再补出一个与“他”同标的代词，或补出后句子不符合语感，这时句子为受事主语句。[8]而当“他的老师当得好”中“他”不从“当”那里取得外部题元角色时，“当”前可以补出一个与“他”不同标的代词，这时句子为受事话题句。

⑧ a.他i的老师（*他i）当得好。（受事主语句）

---

7) 黄正德（2004、2008）指出，动名词词组GP实际上是一种IP/TP。潘海华、陆烁（2011）指出，邓思颖的分析在表层句法中将“他的老师”看做了句子。胡建华（2016）指出，名物化结构或者动名词结构实际上就是句子，只不过是非定式句。

8) 生成语法一般把“饭吃了”作为受事主语句分析，认为句中存在一个脱落的空主语。胡建华（2016）认为，像“饭吃了”这种可以补出施事主语的并非受事主语句，而是省略了主语的受事话题句。

b.他i的老师（他j）当得好。（受事话题句）

胡建华（2016）认为，作为伪定语理解的“他的老师”所在的句子是受事主语句。在此基础上，胡建华（2010、2016）从句中NP与题元关联的角度切入，采取了一种非移位的方式解读形义错配现象，具体的操作过程比较复杂，这里我们不做具体介绍。由于下文涉及题元的特征丛（feature cluster），我们对此做简单介绍。Reinhart（2002）认为，题元由特征丛构成，特征丛的基本成分是表示致使变化（cause change）的c和表示心理状态（mental state）的m，两个成分可以组成8个特征丛：

[+c，+m]施事	[+c]致事
[+c，-m]工具	[+m]感事
[-c，+m]经历者	[-c]目标、受益者等与格
[-c，-m]客体/受事	[-m]论题（subject matter）

在“他的老师当得好”中动词“当”在词库中的题元信息标注为“当（θ1，θ2）”，我们可以将“当”的两个题元用特征丛做如下描述：

θ1：[-c ，+m]经历者
θ2：[-c，-m]客体/受事

我们认为，胡建华（2010、2016）通过设计NP和题元之间的关联规则试图证明形义错配现象中“形”在做非移位解读前提下的合法性，这是十分有益的尝试。但是，胡建华（2016）的分析似乎也存在几个不太明确的地方。

首先，胡建华（2016）认为，“他的老师当得好”这样的结构在普通话中成立而在南方方言中不成立的原因是NP与题元关联时普通话是显著性优先，而南方方言是局部性优先。因此，在南方方言中，当“NP1的NP2”放在主语位置时，NP1无法与核心动词的外部题元关联，因为NP2会优先与之关联。但是，胡建华（2016）在具体分析普通话中“他的老师当得好”中NP与题元的关联情况时，同样是先从局部性出发，认为当“当得好”表示被动含义时，“老师”是无指的，无指的NP2不具备[+m]特征，因此不能通过“题元允准条件”与“当”的外题元θ1关联。这时NP1“他”由于显著度比“老师”高，就可以通过“题元关联条件”越过“老师”拿到“当”的外题元θ1。而且，胡建华（2010）确立“题元允准条件优先使用原则”的时候并没有区分普通话和南方方言。这样看的话，按照胡建华（2016）的分析，无论南方方言还是普通话，在解读“他的老师当得好”中NP与题元的关联情况时应该都是优先考虑了局部性，只是普通话中局部成分NP2此时不符合θ1的

题元连接条件而已。此外，对于为什么说在NP与题元的关联规则中普通话是显著性优先，而南方方言是局部性优先，胡建华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其次，根据胡建华（2010）设立的“外题元优先确认原则”，可以显性释放的外题元要释放为显性论元。然而在“他的老师当得好”中，“当”的θ1与“他”关联，按理说可以显性释放但实际上却不能显性释放，只能作为隐性论元解读。对于这些问题，胡建华（2016）并没有清楚交代。

形义错配现象一直是句法学家，尤其是形式句法学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形义错配问题被提出并在学界成为研究热点也要归功于形式句法学家，也是形式句法学家对形义错配现象研究的成果最多且最深入。形式句法关注句子的动态形成过程，形义错配现象指的是句法和语义的不对应，形式句法学家们“坚信句法和语义是应该一一对应的”（胡建华，2016），不对应只不过是表层展现出来的形式，从句法语义对应（syntax-semantics correspondence）到句法语义不对应必然涉及到动态移位操作，而设计其中的句法推导细节便成了吸引形式句法学家的魅力所在，也加深了我们对汉语句法和语义对应规律的认识。

2）认知视角

从认知视角研究形义错配结构产生机制的学者主要有沈家煊（2007），吴怀成（2008），史金生、邝艳（2010），郝静、贺麟茜（2012）等。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影响较大的“糅合类推”说。

沈家煊（2007）认为生成语法的派生机制过于繁复，于是提出用“糅合类推”的理论来解释形义错配的产生机制。“糅合类推”的基础操作是构拟一个四角方阵：

a　　b
x　　（y）

其中x和y之间的句式和语义关系跟a和b之间的句式和语义关系类似，a、b、x都是已有项，b和x可以加以糅合，取x的语义和b的句式，由此可以推出y句式。例如：

⑨ a.他讲课讲得好　　b.他的课讲得好
　x.他当老师当得好　　y.—— ← xb 他的老师当得好

既然存在“他讲课讲得好”和“他的课讲得好”这样语义相关的句式，那么“他当老师当得好”也可以仿此造出“他的老师当得好”这样的句式。沈家煊（2007）认为形义错

配和意义转指有关，比如，“他的老师当得好”中“他的老师”有“他的老师角色”的意思，可以用于转指“他的老师角色”。“糅合类推”从认知角度较好地解释了形义错配结构的产生机制问题。

吴怀成（2008）借用曹逢甫（2005）宾语前置句（宾语提升为次要主题）的理论，认为形义错配句的形成过程先有一个宾语前置的过程，即“他的老师当得好”这类句式不是在动词拷贝句的基础上直接糅合类推形成的，而是由动词拷贝句宾语次话题化后的句式糅合类推而来。例如：

⑩ a. 他当老师当得好。（动词拷贝句）
b. 他老师当当得好。（宾语提升为次要主题）
c. 他老师当得好。（删除一个“当”）

在a句的基础上，b句宾语“老师”进行了次话题化，然后同音的两个“当”删除了一个形成c句，糅合类推是在c句的基础上进行的。

⑪ a. 他课讲得好　　b. 他的课讲得好
x. 他老师当得好　　y. —— ← xb 他的老师当得好

吴怀成（2008）之所以认为“糅合类推”是在普通主谓补句式基础上发生的，是因为他发现有的“NP1+的+NP2+V+得+R”句式中的NP1可做真定语和准定语两解，如果认为这一句式是在动词拷贝句基础上产生的，则不能从语义上解释变换后句式存在歧义的原因，而认为“糅合类推”前的句式是普通主谓补句式则可以解决关于这种歧义来源的问题。

3）其他视角

邵敬敏（2009）在朱德熙（1982）所举例子的基础上，从语义关系的角度出发将准定语划分为指派性（张三的原告，李四的被告）、技能性（他的篮球打得好）和关涉性（我来帮你的忙）三类，认为三类准定语都是通过结构重组的句式变化形成的。例如，邵敬敏认为“今晚的演出，梅兰芳的苏三，马连良的诸葛亮”经过了以下句式变化过程：

（A）今晚的演出，苏三是梅兰芳扮演的，诸葛亮是马连良扮演的。（原句式）
（B）今晚的演出，苏三是梅兰芳的，诸葛亮是马连良的。（减缩）
（C）今晚的演出，是梅兰芳的苏三，马连良的诸葛亮。（移位）
（D）今晚的演出，梅兰芳的苏三，马连良的诸葛亮。（脱落“是”）

技能性准定语句是重动句先变化成主谓谓语句，然后再在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和小主语之间插入“的”形成的。对于插入“的”的原因，邵敬敏认为是效仿领属性的主谓谓语句。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效仿领属性的主谓谓语句？如果从重动句变换成主谓谓语句的动因是为了追求简约，那么效仿领属性的主谓谓语句而插入“的”的动因是什么？

邵敬敏（2009）认为关涉性准定语句都是先用介词引进某个行为的关涉对象，然后省略介词，再然后把介词宾语移位到动宾短语中间，由于两个宾语句法上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添加定语标记“的”。我们还是可以更进一步追问，插入“的”的动因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增加句法上的紧密度，那么双宾结构是大量存在的，并不存在句法上的问题，这里增加紧密度的目的是什么？在双宾结构并不违背句法原则的情况下，为了增加结构的紧密度却要顶着违背语义关系的代价，以这种理由来解释“的”的插入是否具备足够的说服力？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5. 结语

总结来看，以往对现代汉语形义错配现象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同样存在几个问题：一、缺乏历时角度的考察。以往对形义错配现象的研究，尤其是产生机制方面，大多仅局限于从共时平面探究，缺乏历时角度的考察。二、产生机制上没有达成一致。以往学者们对形义错配现象产生机制的研究多是从某个自己熟悉的理论角度展开，不同理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种观点之间往往又无法融合。而且每种解释方式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情况，只能解释部分现象，对于解释不了的现象就视为例外，或者干脆视而不见，生成语法视角的解释方案有时还存在过度生成问题，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形义错配现象产生机制研究的系统化。三、形义错配概念的外延不够清晰。形义错配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十分清晰的，但是形义错配的范围是不是只能局限于伪定语呢？汉语中形式和意义匹配错位的情况有很多，并不是只有伪定语一种现象。如果从形义错配概念的内涵出发，是否可以将汉语中其他类型的句法-语义错配现象都归入形义错配现象中进行系统研究？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9]

9）庄会彬（2021）和庄会彬、田良斌、刘振前（2021）对上述部分问题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单行本〉
曹逢甫，『汉语的句子与子句结构』，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张　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
庄会彬，『现代汉语形义错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论文〉
程　工、熊建国、周光磊，「分布式形态学框架下的汉语准定语句研究」，『语言科学』，第3辑，2015.
邓思颖，「“形义错配”与名物化的参数分析」，『汉语学报』，第4辑，2008.
_____，「“他的老师当得好”及汉语方言的名物化」，『语言科学』，第3辑，2009.
_____，「“形义错配”与汉英的差异——再谈“他的老师当得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辑，2010.
韩巍峰、梅德明，「形义错配结构及其主题化分析」，『外国语』，第3辑，2011.
郝　静、贺麟茜，「准定语“N1+的+N2+V+得+R”句式的构式语法分析」，『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第1辑，2012.
胡建华，「论元的分布与选择——语法中的显著性和局部性」，『中国语文』，第1辑，2010.
_____，「“他的老师当得好”与论元的选择——语法中的显著性和局部性」，『世界汉语教学』，第4辑，2016.
黄国营，「伪定语和准定语」，『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辑，1981.
_____，「“的”字的句法、语义功能」，『语言研究』，第1辑，1982.
黄正德，「从“他的老师当得好”谈起」，『语言科学』，第3辑，2008.
金镇宇，「从静态、动态的角度看短语和句子的差异」，『汉语学习』，第6辑，1999.
李锦望，「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的组合及其结构、语义分析」，『渤海学刊』，第3辑，1993.
李　敏，「关于定语的几个问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辑，1997.
_____，「论语法分析方法的创新与歧义研究的深化」，『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辑，2006.
李绍群，「现代汉语“名1+（的）+名2”定中结构非典型领属关系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4辑，2010.
刘礼进，「也谈“NP1的NP2+V得R”的生成」，『外国语』，第3辑，2009.
吕叔湘，「语文札记」，『中国语文』，第4辑，1965.
潘海华、陆 烁，「从“他的老师当得好”看句法中重新分析的必要性」，『语言研究』，第2辑，2011.
彭玉兰，「非典型性定语二题」，『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2辑，2001.
_____，「“N1的N2”中的非典型性定语」，『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第2辑，2005.
钱书新，「也谈“N1+N2”结构中“的”之使用规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

辑，2004.
_____，「名词性偏正结构的非原型范畴」，『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辑，2005.
邵敬敏，「从准定语看结构重组的三个原则」，『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辑，2009.
沈家煊，「也谈“他的老师当得好”及相关句式」，『现代中国语研究』，第9辑，2007.
史金生、邝艳，「“他的老师当得好”句式的形成机制」，『汉语学习』，第5辑，2010.
吴怀成，「“PP+的+N+V+得+RC”结构浅析」，『语文知识』，第2辑，2007.
_____，「“准定语+N+V得R”句式的产生机制」，『语言科学』，第2辑，2008.
吴士艮，「再论现代修辞学的创新与发展」，『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辑，2007.
吴早生，「现代汉语光杆被领者的指称性质」，『语文研究』，第1辑，2012.
萧国政，「隐蔽性施事定语」，『语文研究』，第4辑，1986.
许歆媛、潘海华，「“他的老师当得好”的生成路径探析」，『现代外语』，第4辑，2014.
杨炎华，「“他的老师当得好”的重新审视」，『当代语言学』，第4辑，2014.
张伯江，「领属结构的语义构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辑，1994.
张云徽，「汉语两种特殊句式论析」，『许昌师专学报』，第2辑，1996.
庄会彬、刘振前，「“的”的韵律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3辑，2012.
庄会彬、田良斌、刘振前，「“形义错配”概念的扩展与次类界定刍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6辑，2021.
Huang, C. -T. James,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2.
Reinhart Tanya, “The Theta System-An Overview”,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Vol.3, 2002.

<其他资料>
黄正德，「他的老师当得好」，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2024.
梅　广，「国语语法中的动词组补语」，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1978.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구문-의미 불일치, 관형어, 유사 속격, 유사 명목량, NP1의 NP2
	영문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Attribute, Pseudo possession, Pseudo nominal quantity, NP1的NP2

A Review of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in Modern Chinese

Yang Shuai · Kim Mi-Geum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refers to a phenomenon whereby a part of a sentence appears to be attributive in form, but is in fact semantically matched with other syntactic components. Throughout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there has been a certain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some issu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structure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types: pseudo possession and pseudo nominal quantity. Th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structure is not a prototype structure, but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certain prototype structure. The NP2 in th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structure is an undirected component. In addi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at have not reached consensus.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re is a possessiv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structure (pseudo possessive).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posses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P1 and NP2 within the form meaning mismatch structure, while others hold the opposite view.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structures,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scholars with the same research perspective also have specific differences in their viewpoints. The article reviews previous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the qualitative nature of th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structure,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structure, and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 structure. It also briefly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research.

저 자	제1저자	양 수 / 杨 帅 / Yang Shuai				
	참여저자	김미금 / 金美锦 / Kim Mi-Geum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3.11.10.	심 사 일	2023.12.11.	게재확정일	2023.12.19.